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四〇期 ——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404d)

【往事回首】	“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	范达人
【千秋功罪】	毛泽东对文革武斗的责任主要是放纵	印红标
【史海钩沉】	文革中军管干部的困境	文 贝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往事回首】

“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

• 范达人 •

众所周知，“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后期分成九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粉碎“四人帮”后，有两个小组被称为“尖刀班”。可能由于这两个小组出手的文章比较多，加上“态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斗，吃了较大的苦头。我便是其中一个“尖刀班”的班长。我们这个“尖刀班”最后仅三人：陈先达、何芳川和我。据统计，从中共十大以后到1976年10月，“梁效”共发表了181篇文章。当时的重点文章很多出自我们小组之手。我本人参与撰写的文章共34篇，其中已公开发表的28篇。

### 一、奉命撰写《孔丘其人》

为了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1973年10月，由迟群、谢静宜牵头，北大、清华成立了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到1974年初，《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完成后，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之事告一段落。为配合《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发表，“梁效”准备写些大批判文章，由此材料小组转变成写作组。我们所写的第一篇综合性的批判文章，是发表在《红旗》1974年第2期上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此文发表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北京周报》也将它译成多种外文发行。参与写作这篇文章的有我、钟成勋、朱耀庭、杨克明和钱逊，

由我执笔写成。

我们撰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是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和讲话精神进行的。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中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同月17日，毛泽东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自己写的两首诗。一首是《读〈封建论〉——呈郭老》。另一首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又指出：“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都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都主张厚古薄今。”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上述内容，1974年在“梁效”内部均作过传达，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孔丘其人》一文是粉碎“四人帮”后受到重点审查的文章之一。人们认为它是影射史学的代表作，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该文的写作经过如下：

1974年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11时左右，李家宽（“梁效”党支部书记，负责人）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说：“上面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孔子其人》（后改为《孔丘其人》）。这个题目有来头，气魄大，可能是主席出的题目。文章要全面介绍孔丘其人，要写他稍一得势就杀少正卯，要写他到处碰壁。3月8日前发表。这篇文章由你们小组写。”当时，王世敏（“梁效”党支部副书记）在场。我回到组内，即向何芳川、朱耀庭、卢振义、张学政传达了李家宽的要求。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决定集体凑写，由我执笔。我们开了三四个夜车，终于写出一稿。李家宽和王世敏对初稿基本满意，李认为写得不错，开头和结尾均有气势。李要我们向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念一遍初稿。大家听了后提了一些意见。李家宽指定杨克明和汤一介两人再与原写作小组一起修改一遍。修改后我们将铅印送审稿交李家宽，李再送迟群、谢静宜。次日，李传达说：“迟群认为根本不行，谢静宜说差得远呢。”他们的批评像一盆冷水泼将下来，使我们很扫兴。我们小组只得继续修改。李家宽、王世敏与我们讨论了一次。王世敏认为写孔丘其人应概括孔子的几个特点。我们根据王的意见在文中列出五个小标题，又打印出一稿，发到各组征求意见。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李家宽又下达两条指示：“一、写一段孔丘压迫妇女的情况；二、要通俗易懂，不要超过三四千字。”也就在此时，江青通过迟群催稿。她说：“我叫你们写篇孔子其人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来，我就叫别人写了。”3月10日左右，迟群又找写作小组谈了一次。他先逐一询问我们的姓名和原来的工作，然后，要求查一下孔丘父亲的名字，写入正文。他还说，看过修改后再提意见。隔了两三天，迟群对李家宽说，他对修改稿的意见已经对叶朗谈过了。原来，一天晚饭后，迟群在叶朗房间内，看到叶对《孔丘其人》打印稿批了很多意见，甚为欣赏。迟群认为，文章平得厉害。此刻，我已感到无能为力。何芳川却说：“我来动一下，单独改一遍。”何的修改稿稍有改进，但仍未达到要求。李家宽鉴于单靠写作组人马，难以完成任务，便调动大批判组各组力量进行改写或另写。一天，在会客室内，各小组宣读改写或另写的稿子。李家宽比较欣赏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认为改得较好，有新意。我提出以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为基础再去加工。杨克明等同志怕挫伤我们小组同志

的积极性，建议仍由原写作小组继续修改。最后，李家宽决定除原写作小组范达人、何芳川、朱耀庭三人外，再加叶朗和张德两人，综合各组成果，特别吸收叶朗、杨克明小组的成果，写出一稿来。新的一稿，李家宽看后表示满意，铅印后送迟、谢。他们亦认为基本可以。迟群通过他的秘书庄昂告诉我两点意见：在“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一段后面，有点概括为好；另将第四部分“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三不会用兵打仗”中“三不会用兵打仗”删去。我们按照迟群的意见作了改动。大约在3月20日左右，此文终于印成送审稿。李家宽除通过迟、谢上报外，特派我将稿件送《红旗》征求意见。他还给《红旗》负责人写了信。江青收到送审稿后，批给姚文元，姚立即通知《红旗》采用。《红旗》编辑黄达强告诉我：姚文元认为文章写得比较生动，决定在1974年《红旗》第4期上发表。《人民日报》随后转载了这篇文章。李家宽表示不悦，他说怎么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三版上？《孔丘其人》发表后不久，迟群秘书庄昂在大批判组所在地北招待所前对我说：“《孔丘其人》写得真妙，孔丘参加政变那部分，正好合上李德生。”又一天，在大批判组会客室召开的一次会上，当谈到《孔丘其人》一文的反映时，迟群说：“你看像谁就像谁。”同年6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说：“我叫迟群组织写一篇《孔丘其人》的文章，文章写得生龙活虎，但有一点缺点，外国人看了说‘没有引孔丘的原文’。”

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为反对周恩来总理，主要依据是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却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学生要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鸣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贱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休息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一些人认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是影射周总理。这段话出自我手，后来成为本人的一大罪状。我从上海《学习与批判》刊登的《孔子传》中看到类似描述，然后查阅《孔子年谱》，进行核对，认为材料可靠且刻画孔子复辟形象生动，才加以采用。退而言之，当时总理根本不是“七十一岁重病在床”。

人们认定“梁效”影射攻击周总理还有另一个依据，即叶朗等人写的一篇文章，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据当时在注释组工作的周一良教授回忆：江青命令把记述孔子生活的《论语·乡党》篇译成白话，供广大群众批判。这个任务当然落实到注释组。篇中讲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态，有一句“趋进，翼如也”，描写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几个人反复推敲捉摸，想不出恰当译法。魏建功老教授灵机一动，说“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张开两臂，形如鸟之双翼。但直译“如鸟张翅”不太雅驯。不如说“端着两个胳膊向前急走”，更为传神。魏老说着站了起来，端起双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家连忙一致赞成他的说法，就这样定了稿。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学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两个胳膊”是影射周总理，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总是弯曲像端着。魏老当然多次被审讯，异常紧张。注释组的每个成员也都被提问。大家一致承认这句译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决无藉此攻击总理之意。退一万步说，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膊”呀！（《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粉碎“四人帮”后，还有人揭发1974年6月，江青一行在天津时曾有人提到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据我所知，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在天津市委招待所内，王世敏给我们念一些文件，其中第一份是毛主席与李政道博士的谈话，第二份是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她在读世界对中国的评论时，的确念到“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与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斗争”的内容。当时，谢静宜说：“那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并要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妄评。在场的我和其他

一些同志并未意识到是授意我们反对周总理。

有的人还认为我们借批判孔丘“述而不作”来影射周总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我们的文章在谈到孔丘是不学无术的寄生虫时，套用了毛主席“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用兵打仗”，将孔丘写成“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三不会用兵打仗”。迟群看稿时删去了“三不会用兵打仗”。当时我还想不大通，认为一、二、三点连下来形容很好，为何删掉呢？迟群的用意，我不清楚，然而就我本人而言，毫无以此攻击周总理之心。

我与《红旗》编辑王达强核对清样时，甚至特地在这篇文章引言“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中的“一类政治骗子”前加上“这”字，旨在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

1998年1月，我曾向谢静宜问及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她说：“《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议写的。目的在于简明扼要地介绍孔子。我就此事专门请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写这篇文章。文章在公开发表前，我们曾将文稿报送毛主席和周总理阅审。”

如果要问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么，坦率地说，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从内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骂他是“大恶霸”。1974年2月间，江青叫陈亚丁到她那里开会，她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理。”会一开完，总政就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李德生”。这事传到了“梁效”大批判组。在此影响下，我们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个“凶狠残暴的大恶霸”的小标题，影射李德生。这是实情。

《孔丘其人》一文发表后，我们参与写作的人方得以松口气，稍事休息、调整。一天，我到21楼历史系教师宿舍去聊天，在郝斌房间内坐了一会儿，突然感到浑身不舒服，随即躺下，呈轻度休克状。郝斌问我怎么啦？怎么办？我使尽力气请他打电话告诉写作组。后来，李家宽派了辆汽车将我接回驻地。这次休克并非什么病症引起，而是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写《孔丘其人》的结果。在家休息二三天后，我又回到了写作组。当时，我的工作劲头很大，曾说过“我们不能在这儿吃干饭”。这句话一度成了我的“名言”，后来则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 二、批儒评法

继《孔丘其人》之后，“梁效”所写的较为重要的文章是《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这是一篇《红旗》杂志的特约稿件。

1974年4月初，《红旗》编辑部的邵铁真同志打电话给我，约我们写一篇读《盐铁论》的文章。我将此事向李家宽作了汇报，李把这一写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小组。由于何芳川和我过去是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的，不太熟悉中国古代史，于是我们便先把《盐铁论》原文找来仔细阅读，然后按照自己的构想，讨论出一个提纲。我们的主导思想是批判贤良、文学们所鼓吹的复辟倒退，肯定桑弘羊的革新进步，将两者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大约在4月5日左右，我们写作小组四人（我、钟成勋、何芳川、朱耀庭）到《红旗》杂志社与邵铁真、何望贤商量如何撰写此文。邵是《红旗》的老编辑，何则刚从湖南调来。邵提出两点要求：一、强调中央集权。他说毛主席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措施，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二、批匈奴，影射苏修。关于霍光问题，我们提出，这个人物是儒家还是法家，看法有分歧，不好写。邵说，不好写，暂时避开也行，或者按你们的意见写上也可以。邵还给我们念了江青于1974年初对宣传口负责人关于儒法斗争史的讲话。

我们小组返回驻地后，就分头起草。由于我当时健康状况欠佳，商定由何芳川起草开头和第一部分，钟成勋起草抗击匈奴部分。何芳川在草稿中把霍光写成儒家。我记得他当时的根据是：一、《汉书》一个传内说霍光是支持召开盐铁会议的；二、桑弘羊是被霍光杀害的，他们是对立面；三、汉宣帝是法家，他视霍光“如芒在背”。我们在通稿时同意何的意见。文章初稿约于4月15日左右送到《红旗》。一两天后，邵铁真和何望贤又找我们谈了一次，他们认为初稿不太理想，要改写，并且对第一、二部分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还要求增加第三部分，谈谈儒法两家思想、路线方面的对立。我改写了第一段中关于批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部分。何芳川增写了第三部分。我们四人集体通稿一遍后，将定稿送到《红旗》，《红旗》认为可以，略作了一些修改。关于霍光的一些提法便是《红旗》加上的，如“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此文发表在《红旗》1974年第5期上，受到了江青的称赞。

《论商鞅》一文由何芳川、钟成勋两人同时起草第一部分，朱耀庭起草第二部分，我起草第三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红旗》曾要求我们查查苏修攻击商鞅的材料并可以有针对性地批判几句。5月中旬，文章初稿写成，经李家宽、王世敏、宋柏年审阅后送《红旗》。余征认为写得一般，理论分析不够，我们又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此文发表在《红旗》1974年第6期上。

宣扬法家的文章还有一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这篇文章也出自我们写作小组之手。后来，有人批判此文名为颂扬武则天，实则吹捧江青。1974年6月底，当我从天津返回北京时，何芳川立即告诉我，各组都在写法家人物的文章。我们决定按原计划，介绍和评论唐朝女皇、法家武则天。何芳川已开始阅读有关唐史的资料。由于我对唐史所知甚少且又比组内同志晚看了几天，所以我们商定，由我起草开头和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和谈谈当时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何芳川起草斗争内容和局限性，即第二、三部分。文章写成后，我们两人通了一遍稿，由我执笔。题目定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初稿打印后，曾拿到大批判组范围内讨论过一次，杨克明等人认为此文写得一般，陈先达不同意文中“阶段性转折”的提法。按照大家的意见，我们又进行了修改。最后，李家宽将文章题目改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经迟群审稿后送到《北京大学学报》和《教育革命通讯》发表。这篇文章仓促成，质量不高。李家宽曾专门拿来一篇清华大学幼儿园老师写的文章，题为《谈谈对武则天的几点看法》，说我们的文章还不如她们写得好。后来，清华大学幼儿园老师的那篇文章与我们的文章同时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上。

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江青曾在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讲到武则天。我未参加那次座谈会，江青谈话内容我是事后听传达得知的。她说：“当时二十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嘛，这一定有她的社会基础，她的政策符合更广大的地主阶层。”后来，在天津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又一次提到武则天，内容与前次相仿。我们在起草《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时，将江青的讲话视为“精神”，贯穿在文章之中，但无意把武则天与江青作历史的比拟，在我们看来，封建皇帝武则天和毛主席夫人是不能比附的。另外，文中点出武则天的局限性与过失，亦非影射江青。

1976年3月2日，江青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再次谈及武则天。她说：“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

###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0月，清华大学校园内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同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吕方正联名写信状告迟群、谢静宜，说迟群未当上教育部部长，牢骚满腹，情绪低落，烧被褥，摔杯子，平时工作作风专横跋扈，等等。刘冰等人给毛主席的信通过邓小平转到毛手中，同时抄送北京市委负责人，并口头将信的内容向市委科教口负责人作了汇报，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查处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刘冰等人之所以联名写信状告迟、谢，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前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经验主义”问题上作了批示后，又在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做法，并反复告诫“不要搞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一系列指示，邓小平在5月27日至6月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先后发言，就江青说“同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反经验主义等问题，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进行了批评。江青等人说开这个会是突然袭击，是围攻。邓、叶、李三人反驳了这个说法。在这个会上，王洪文检讨了几句，江青未认错。后在1975年6月28日才作了书面检讨。

刘冰等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的信。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支持刘冰等人，相反，完全站在迟、谢一边。他在信上作了用词严厉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这样便给清华园内的这场斗争定了性且纲上得很高。

迟、谢根据这一“尚方宝剑”召开党委扩大会，批判刘冰等人。起先，刘冰等人态度强硬，不认为反映情况有什么不妥。后来，据刘冰回忆：11月15日，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到毛主席对清华的上述批示，“真如晴天霹雳！……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清华校园内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会，规模越开越大，最后竟召开万人大会。“梁效”成员有时也允许去听会，我就去听过几次。当时，不仅要批刘冰等四人，而且也要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周荣鑫。据说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上告周荣鑫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负责人班子中赶走。毛泽东支持了这封信。反击“右倾翻案风”便由此掀起。

毛主席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指邓小平。过去，我对邓小平怀有好感。后来，我随毛对邓的态度而起伏。

文革初，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邓小平耳朵聋，开会时他坐得离我远远的。”当时，我曾与朋友议论过此话的含义，他认为，这是毛主席嫌邓小平不听他的话。毛泽东还批评邓将中央书记处搞成了独立王国。北大聂元梓等人随即贴出一张大字报：“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列举了他很多“罪状”。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泽东在处理刘、邓二人问题时态度不同，方法也有所区别，对邓小平仍采取“保护政策”，并非置邓于死地。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等人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1972年，北大工宣队向北大党员传达过一份中央文件，该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邓小平的长篇检讨摘要；二，毛泽东对邓小平检讨的批示。先传达了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

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的检讨很长，据说约有四万字，因此，只摘要向我们作了传达。

1973年邓小平获得“解放”。毛泽东一步步迅速地安排邓当了党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那时，又传达下来毛对邓的两句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据此，邓小平便进而成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长。此时，其地位已高于文革之前。周总理病重之后，便由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

复职后的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行全面整顿。他就此发表了多次讲话。当时，邓的讲话未向“梁效”成员传达。不过，我们从小道也听到一些。我个人觉得邓小平实际上是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一套。

毛泽东曾表示，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他是绝不会允许的。因为毛泽东视文革为反修防修的战略决策。据说他希望邓召开政治局会议，搞个关于文革的决议，遭到邓小平有礼貌的拒绝。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此后，毛对邓的态度大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相当激烈、尖锐。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此会文件，向“梁效”成员作了传达。该文件称：“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此时，《红旗》杂志又向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约稿，要求写一篇文章，批判教育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的写作任务交给了钟哲民小组。为写好此文，调去了我们组的何芳川。他们以周荣鑫的言论为靶子，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逐一进行批判。该文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为题，发表在1975年第12期《红旗》上，随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发出一个信号：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又要开始，其目标则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后来，我们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毛远新将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整理出来，冠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标题，逐级传达下来。

1976年2月25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邓小平同志负责。他要求大家“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我们将上述指示视为毛泽东的最新思想和党中央的最新精神，认真学习，反复领会，并努力贯彻。大批判组写完《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作为“信号弹”的文章之后，接着由我们小组承担起另一篇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写作任务。

这篇文章也是《红旗》杂志的特约稿件。姚文元向迟群、谢静宜打招呼，要我们再写一篇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迟、谢交给我们一些背景材料：一，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有关胡耀邦、李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二，胡耀邦自己写的《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梁效”将胡的这份提纲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汇编成册，称之为“三株大毒草”，供人们批判。这一小册上报中央后，得到了华国锋等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是“梁效”发出的又一颗重型炮弹。此文由我、何芳川和陈先达起草。其特点是：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我们在动笔之前，还听了胡耀邦一次讲话录音。那是他向中国科学院共青团员们作的一个报告，他鼓励青年团员发奋学习科学知识，向科学进军，作一名新长征的战士，为国家早日现代化而奋斗。胡耀邦的这篇演说富于激情，很有鼓动性。

《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矛头直指胡耀邦、李昌，进而逼向邓小平。我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和从清华大辩论中得到的一些材料，将“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了全面的概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该文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不少人写文章时都加以引用。

为了批所谓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特地查阅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因为其中有驳斥右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内容。

此文在发表前，我们还找北大化学系、物理系一些骨干座谈，听取他们对文章的意见。在那种大气候下，他们当然不会提出什么相左的意见。

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是在1976年春节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开收音机，听到正在播放《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当时，我很兴奋，自以为领会、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事后看来，此文颠倒是非，扰乱人心。

1976年6月份，《红旗》又来约稿，要我们写一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与何芳川、陈先达三人查了很多邓小平的言论，查来查去，感到邓小平与林彪不大一样，他没有什么尊孔的言论。只找到一句“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么，文章怎样写呢？我们三人与《红旗》杂志的编辑一起讨论，决定把邓小平与孔孟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何谓从本质上联系？就是说，孔老二要复辟，要恢复周礼，邓小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从搞复辟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于是，我们便牵强附会地写出了这一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将邓小平与孔孟之道连在一起。这篇文章发表在1976年第9期《红旗》上。

在批邓过程中，“梁效”曾将邓小平几年来的讲话编出一份《邓小平言论》，供批判用。其中收进了邓小平授意，胡乔木、邓力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乔木和邓力群曾把交待材料报送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华又将它转给了“梁效”。

邓小平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约于1976年2、3月间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这



是李家宽向“梁效”成员传达的。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罢了他的官。我们的文章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但是，后来听说事发那天，邓小平既没去天安门，也没有在幕后指挥，而是到前门饭店理了发。因此，我们只好说他实质上是后台。

#### 四、《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粉碎“四人帮”后，《光明日报》1976年10月4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被定性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动员令。因此，起草这篇文章的我们小组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

毛主席逝世后，《光明日报》向“梁效”约稿，要我们写一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主要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李家宽问我们组能不能写。

对毛主席逝世，我个人已在北大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悼念文章，题为《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刊登在1976年9月16日的《新北大》上。当时我崇拜毛泽东，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尽管文革初期，我受到冲击，遭到批斗，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的思想逐步被其征服，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论。我认为毛泽东知识渊博，文史哲造诣深，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对世界亦有广泛影响。他的逝世，犹如巨星陨落，令我悲痛不已。这篇悼念文章充分表达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心情。

对《光明日报》的约稿，我却兴趣不大，因为此时我正准备赴波兰工作，整天在学习英语。现在，李家宽既然找到头上，那就写吧。我便将此事告知两位组员何芳川和陈先达，他们也是持“要写就写吧”的态度，不甚重视。不久，《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孙关龙应约来到“梁效”驻地，与李家宽和我们小组的同志一起讨论文章的主题。孙一开头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项重要指示，因为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句话用粗体字刊出。”我对此也深信不疑，早在8月份，我已从《人民日报》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两点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

9月20日上午9时，汪波清、孙关龙在光明日报社对我、陈先达、何芳川等人谈了对该文的要求。孙关龙说，我们理论部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伟大意义，这六个字，字字千金，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接着，孙关龙对文章的路子、内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提纲：首先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管我们这一代、下一代，还要管世世代代。违背这一点，党就变修，国就变色。然后谈谈为什么必须“按既定方针办”。回顾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已经为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歌颂主席思想的伟大发展。违背就失败，遵循则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按党的基本路线办。再谈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一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当前，在国内要批邓，在国际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最后要强调，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要树立必胜的信念。汪波清补充说，最有说服力的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蓝图已绘好，问题是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另想一套。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还是这样，要鼓舞必胜的信念。孙关龙还谈到国际共运史的经验不太好写，马恩逝世后，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斯大林逝世后，出了赫鲁晓夫。汪波清说毛泽东思想现在深入人心，马恩那时两个人，现在八亿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在讨论结束前，汪波清把师海云找来，请他念了一遍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传达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孙关龙和汪波清还给我们看了新华社内参关于对

“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应。

文章大意明确后，我对何芳川说：“你先起草，然后我们大家修改。”那时我只想尽快赴波，已经心不在焉。何说：“行，我起草。”并说：“这不是什么大文章，几千字就行了。”初稿完成后，由我执笔修改，我未作大的改动，只作了一点非实质性的文字润色。这篇文章便于9月24日左右定稿。经李家宽等人同意后送《光明日报》。9月30日下午，迟群电话告李家宽：“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包括《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同日，《光明日报》排出清样，让我们再审一遍。清样复审后立即退了回去。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该文的标题是我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就是如此，并非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

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责令我们写作组交代“四人帮”是如何授意写作此文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报刊文章把这篇文章定性为“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矛头指向华国锋主席”等等，真是令我啼笑皆非。后来，上面还要《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和他的副手孙关龙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此事审查了多年，也没查出“四人帮”与这篇文章有何直接关系。

当时，对我们施加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华国锋主席，他一口咬定我们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他的，这就将我们置于反党反革命的绝境。

当时，我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尊敬，同样也信任和尊敬华国锋，拥护他出任要职，丝毫没有反华之心。甚至在修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时，我还按照华国锋在毛主席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提法，作了变动，如第四段“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文章的第十二段，我加了一句：“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暴风雨中考察和锻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通稿时，我举例说：“譬如华国锋同志就是久经考验的，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我拥护他还唯恐不及，又怎能去反对他呢。

实际上，从范硕所写《“四人帮”覆灭记》等材料反映的情况看，当时高层的政治斗争也渐趋尖锐化，华国锋等人只是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借口，这大概才是历史的真相。

□ 《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

【千秋功罪】

毛泽东对文革武斗的责任主要是放纵

• 印红标 •

◇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主要通过文斗 武斗则是最残暴的一面

凤凰历史：前段时间宋彬彬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道歉，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说她没有反省打死人的错误，道歉不深刻，您怎么看？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群众中，频频发生殴打折磨人，甚至打死人的残酷现象，这是文革的罪恶之处，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接受的。

据我目前接触到的资料，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殴打折磨校领导致死的事件

当中，宋彬彬没有参与打人，还曾经与文革委员会（或者师生代表会）的刘进前去劝阻。她们没想到会打人致死，态度不够坚决，没有盯在那里。她们走后，一些学生再度实施殴打折磨，致使学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身亡。

宋彬彬主要是为她参与在学校里张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以及发生打人事件期间，作为文革委员会（或师生代表会）副主席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而道歉，即为文斗而道歉。没有参与打人（武斗），也为批判和伤害老师（文斗）道歉，这是应当做的事情。至于当时的文革委员会（或师生代表会）有多大权威，她的道歉是否深刻，还可以再考究。

打人在文革中被称为“武斗”。“武斗”泛指暴力尤其指打人等人身侵害行为，与之对应的是政治的批判斗争，动口不动手，被称为文斗。这里有必要说说文斗与武斗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对人们，更普遍、更深刻的是政治上的伤害，文斗是主要的基本的形式，是文革领导者提倡的。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打死老师之类的事非常耸动、突破善良人们的情感和道德底线，因此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然而事实是：文化大革命的作恶方式，主要是文斗、即政治的无情斗争、残酷迫害；武斗（公然打人，打死人）则是最能揭示文化大革命残暴的一个方面。

凤凰历史：为什么说文斗比武斗对人的伤害更深刻？

印红标：武斗固然恶劣，但文斗更普遍、更深刻。文化革命的目标不是要打人，把所谓走资派、阶级敌人打死，它是要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批判、斗争、打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其他阶级敌人。实现这个目标靠的主要不是武斗，而是文斗，即恶意攻击、栽赃诬陷、人身侮辱，甚至大会批斗、游街示众等等政治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主要内容是文斗。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十六条”中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人民日报》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传单里写道：打人只能触及坏人的皮肉，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林彪在天安门讲话：“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从本质上说，文革不是以打人杀人为目标的革命，不是武装斗争。刘少奇是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他被迫害致死，但不是被打死的，是被“整”死的。

◇ 文革武斗不同于希特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

印红标：毛泽东讲过不用武斗，但是为了发动群众运动，又纵容暴力。文革中武斗大量发生的主要政策原因是毛泽东放纵积极分子的暴力行为。很显然，他担心对这些人做太多限制，会不利于运动的发动，这是在运动的初期。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的某些时候，他纵容武斗，是因为不愿他所器重的一部分群众受挫。例如在1967年的上海。中心是为了使运动按照他的意图发展。这和希特勒有纲领，有组织地杀害犹太人不一样。

文革中对暴力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党的政策，正式文件上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等等；另一个标准是“十六条”引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以及在运动中被广泛引用的，上述文字下面的话“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赋予暴烈行动革命的意义，含糊地一定程度地容忍了打人。

在红卫兵的所谓“红八月”，打人的事件发生后，中央的政策是不追究凶手的刑事政策。1966年8月下旬，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打死就打死了，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这不仅是谢富治的态度，也是最高层的政策。

凤凰历史：卞仲耘在6月下旬工作组召开的批斗会上受过比较严重的侮辱和殴打，在8月5日更是被殴打致死。但是毛泽东在8月18日接见宋彬彬的时候，还说“要武嘛”，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在暗示可以打人，您怎么看？

印红标：首先，毛泽东是否知晓卞仲耘校长被害事件是个问题，需要考察。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接受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与卞校长被害没有直接关联，并非要借此号召打人杀人。

其次，要防止对“要武嘛”三个字的过度阐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回答说：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客观地看，毛泽东的说法更像是随口开的玩笑。

次日《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宋彬彬，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三个字，遂以宋要武（宋彬彬）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对“要武”做了一通发挥。文章联系到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语录“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等，还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造反了，要武了等等。这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不良作法和文风。记者文章对“要武嘛”进行了夸张的、过度的解读，但是仍然有限度，即没有鼓动打人。我询问过的一些文革过来人，他们当时并没有把报纸报道毛泽东讲“要武嘛”，理解为可以打人，更不用说杀人，只想到毛泽东此前赞扬女民兵的诗句“不爱红妆爱武装”，毕竟中央的“十六条”明明白白写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之后，红卫兵的传单报纸多起来，我看到过不少，但是没有看到将“要武”作为实施暴力的依据。公然鼓吹“红色恐怖”的文章很少，我看到两篇，但都没有提到“要武”。我的见闻有限，也许新的资料会导致另外的结论，但是我只能依据资料说话，不能靠想象。

40多年前记者的文章过度解读“要武嘛”三字，40多年后的某些说法也在过度解读，尽管一个是为了吹捧，一个是为了谴责。

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刘少奇、邓小平的基本政策主张是反对脱离工作组（或党委）领导的“乱斗”及打人，但是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主持的批判会上发生了殴打卞仲云的现象，据说是因为出现了工作组对会场的失控。

◇ 毛泽东对武斗的责任主要是放纵 有时会为政治目的而客观上造成支持的效果

凤凰历史：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是怂恿，您认为是这样吗？

印红标：我认为毛泽东主要的责任是放纵，不过有的时候、为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指责限制群众，实际上造成支持的效果。至少在1966年夏季是这样。

比如北京大学的“6.18”事件（编者注：即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在工作组不在时，自发批斗“黑帮”。批斗过程中发生了侮辱人的现象，如挂牌子、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身上，拿纸篓扣在被斗人头上等。）发生后，工作组认为这是乱斗，不能这样做。刘少奇批示说，制止“乱斗”是对的，还批示转发至全国，要求注意纠正“乱斗”。

工作组是上级组织派来领导运动的，学校里的斗争都要服从工作组领导。工作组在政治上有“左”的错误，但仍然被毛泽东批判为压制群众，工作组组织的批斗还算有分寸、有底线。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有时也会发生打人事件，但一般会被工作组制止。但是毛泽东说“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以后，谁还敢纠正？各级领导都不敢纠正乱斗、打人

的现象了。毛泽东抓住了工作组否定的东西，然后把它翻过来。这样的作法，显然是为了反对他的政敌，给政敌找茬。这就加剧了群众暴力行为。

有些学者用西方人熟悉的、能够听得进去的方式谈文革，把文革简单地说成是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意在打人、杀人。不能不说，这种对文革的诠释偏离了历史事实。

◇ 多数人是在自己受到伤害后才反思文革

凤凰历史：您的书中写到遇罗克、王容芬等青年对文革的批判和抵制，为什么当时也存在不同声音，却没有办法阻止文革悲剧的发生？

印红标：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控制了全党，又通过近十年的政治教育控制了青年一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等是文革中青年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基础，当时能够跳出这个思想藩篱的人很少。

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王容芬在1966年9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毛泽东：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她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她把这封信抄写数份，分别邮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本人、共青团中央等六、七处。然后身揣一份那封信的德文译文，在苏联大使馆附近，边走边喝下四瓶敌敌畏杀虫剂，向大使馆方向走去，期待以死抗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能被世界知道。

遇罗克以青春和热血为受家庭出身歧视的青年呼唤平等的权利，已经广为人知。这些都是青年中值得尊重的先知先觉者。然而，思想的前驱总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

虽然有不同的意见、有抗争的声音，但是为什么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因为多数人拥护毛泽东、愿意跟着毛泽东走。个别人提出的抗议没能影响整个运动的发展，必须有一批人，才会影响到整个运动的发展。几千万青少年的思想，一时很难被极少数先驱者的想法改变。

多数人像大潮一样跟着毛泽东走，他们也会遇到一些难于理解的问题、感到跟不上，但是当自己或者家人亲友受到打击，情况就不一样了。据我观察，大部分人是从自己和家人受到文化大革命伤害之后，才逐步地重新思考问题。比如，冲击知识分子和“黑五类”阶级敌人非常激进的老红卫兵，只是当他们的家长普遍受到冲击之后，才开始了怀疑和动摇，直到最后的批评。

◇ 文革中多数人都信仰毛泽东 但各人心目中的毛泽东不一样

凤凰历史：多数人像大潮一样跟着毛泽东走，为什么红卫兵还会产生派别呢？

印红标：红卫兵的派别是由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原因所造成。比如，虽然大家都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但有人会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话讲得好，对另一些话“不理解”；而他“不理解”的，有可能是别人喜欢的。

政治运动中个人的好恶具有社会、政治上的原因。人们都信仰毛泽东，但由于社会和政治处境的差距，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并不一样。

凤凰历史：具体来说，红卫兵思想上之所以会产生派别是跟个人处境有关系？

印红标：是的，相关性很高。所谓政治处境，就是政治上是否靠近领导核心，是领导（工作组或者党委）眼中的左派还是右派。社会处境就是家庭出身，这也和政治也有关系。一般地说，政治方面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认为这个书记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那个校长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可以在两派人中选择。但是社会方面，个人的家庭出身没有办法选择。

凤凰历史：您将红卫兵分成哪些派别呢？

印红标：我结合红卫兵运动中比较重要的事件和分歧，把红卫兵大概分成四派。

第一派是老红卫兵，它的社会特点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而且是中高级干部子弟。“红五类”虽然包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但是工农子女在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学校比例很低，政治活动能力也不强。

老红卫兵只在北京形成有力的派别，因为只有北京才有那么多的领导机关，有足够多的官，才有足够多的干部子弟，能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各大中央局（编者注：即1961年1月，成立的中共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中央局。1966年，文革开始，各中央局被撤销。）所在的大城市也有一批干部子弟，比如西安、沈阳和上海，有一些类似北京老红卫兵的组织，但是他们不够强大。老红卫兵的典型形态还是在北京，其他地方没成气候。

西安有“红色恐怖队”，沈阳有“红后代”，基本汇入保守派。

顺便说说，后来在一些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的对峙中，佩戴黑色“红卫兵”字样的袖章，称为“黑字兵”，这是“老”资格的象征。因为毛泽东没接见红卫兵之前，印染社不给自发成立的组织印袖章，红卫兵只能自己用墨汁在红色袖章上涂写“红卫兵”三个字。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的袖章，“红卫兵”是黑色的。第一次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照片没有加工。毛泽东带的是黑字红卫兵袖章。后来新华社再发表，改成黄字袖章，大概是为了好看，但是就露馅儿了：它不是现场的真实照片，而是经过加工、不符合事实的照片。最近多数网站贴上去的还是这种失真的照片。可见传媒失真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 老红卫兵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下谋求特殊利益

凤凰历史：老红卫兵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毛泽东会支持他们？

印红标：老红卫兵做的第一件事是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教育革命批判老师、批判校长、批判教育路线。第二件事就是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但这不是毛泽东的意图，而是老红卫兵的私货。相对应的，反“血统论”也是造反派的私货。

“血统论”是什么呢？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一张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中这样写：“有人称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无上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或生长在红色的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就饱受革命的教育，我们老子是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有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编者注：“自来红”是北京一种月饼的名称，文革前借以批评一些不顺从领导的干部子弟，要他们做经过思想改造的“改造红”，不能自来红。）

文化革命中，老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对立的两派。老红卫兵最早造反，但是不叫造反派。批

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出身中等甚至不好的中学生也成立了红卫兵，这才是中学的“造反派”。老红卫兵就说：“崽子们都起来了，翻天了。”（编者注：崽子，即狗崽子，是文革中对出身不好的人的诬蔑性称呼。）老红卫兵鼓吹血统论不是毛泽东的号召、造反派反血统论，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但也难说是毛泽东需要的文革主流。围绕血统论的争论，是出于学生自己的利益和社会要求产生，带有自发性，所以具有社会意义，而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意义不大。

凤凰历史：文革前老红卫兵和造反派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为什么老红卫兵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印红标：这一代人属于战后出生的“婴儿潮”。到50年代后期，升学中就出现了教学资源或者优质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竞争逐渐尖锐，重视家庭出身与此直接相关。1962年毛泽东重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以后，家庭出身就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进一步强调了。

当时虽然强调出身好，但也不是说出身好就等于一切，在政治方面还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要靠近党团组织、服从党的领导。所以有时也会批评某些干部子弟，要求他们接受党的教育、改造思想，真正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这种以承认特殊地位为基础的批评是一种爱护。但是有人就认为受到压制。有些干部子弟自以为是，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不那么听老师的话，倒是一些出身中等或者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他知道自己政治上不行，所以特别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又好。老师自然喜欢学习好的人，喜欢听话、有礼貌的乖乖女、乖乖仔，而干部子弟中的有些人，就不那么顺从，所以就发生了摩擦。

文化大革命以前，出身不好的人，在升高等学校时已经受到了限制。在别人看来，干部子弟享受的待遇已经够不平等的了，但是一些人还认为不够，追求极端的家庭出身优待和歧视政策。文革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被指责贯彻阶级路线不利，“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说法就这么产生了。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中写到：“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握！”他们掌权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来自血缘关系，他们的父亲。但这又不是简单的血统论。他们的逻辑推理是：我的父母革命，我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是红色教育，所以我也革命。所以我比出身资产阶级，受资产阶级教育影响，还需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线的人，更应该享有优先权。老红卫兵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下，争取特殊利益，比如更多更好的升学机会，成为革命“接班人”，即政治发展的机会。

◇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根本原因：他们跟工作组有矛盾

印红标：老红卫兵做的第三件事是坚持不受工作组束缚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有些干部子弟得到了一些信息，比如毛泽东在跟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和春节讲话中，对学校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他们听得很入耳。所以清华附中红卫兵刚成立时，是由一些批评校领导的学生组成。这里面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干部子弟，也有个别中等出身的人。因为他们挑战清华附中学校领导的权威，真正能跟他们走的人很少，顾不上讲求出身。

在批判学校领导时，红卫兵组织是自发成立的。工作组来了以后，支持他们批判学校领导，但要求他们服从党团组织系统的领导，这就和红卫兵发生了摩擦。工作组认为他们是左派，把他们吸收到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吸收到团委中，已经把他们捧得很高，但是要他们解散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就是不解散组织，并且提出比工作组更激进的主张，不愿意按照工作组的要

求团结大多数同学。

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基本是由共青团中央派来的。他们认为一些左派组织批学校教育、学校领导，在运动初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组织长期存在效果不好。邓小平的指示就是：要用共青团组织去“消化红卫兵、融化红卫兵”。也就是说，要使红卫兵的头头成为中学团总支或者分团委的负责人，同时解散红卫兵组织。

老红卫兵认为工作组不够革命，不够彻底，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组织，不愿意事事听工作组的指挥，认为自己应该有一些独立性。红卫兵说：“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但这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只是政治上的，不是组织上的，是基于他们的理解而服从。这违背了共产党历来对一切群众团体的基本要求。刘少奇说：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刘少奇还指示：学生搞的自发组织还是要用党、团组织来代替。党外、团外，都不能搞秘密组织、秘密活动。搞秘密组织，后果不好。

老红卫兵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无视共产党不允许在党团组织之外另搞组织的原则，从而与工作组摩擦升级。这才是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根本原因——他们跟工作组有矛盾，他们有追究工作组路线错误的冲动，可以一级一级追到中央的刘少奇。

凤凰历史：所有干部子弟都跟工作组有摩擦吗？陈小鲁、宋彬彬他们好像跟工作组关系比较好。

印红标：工作组是着力贯彻所谓“阶级路线”，扶植高级干部子女的，但是仍然发生了摩擦。

海淀区有很多部队大院的干部子女，跟工作组搞摩擦的多是海淀区的干部子弟。西城区则是国务院机关大院的子女比较多，他们的父辈跟周恩来的关系比较密切，比如四中的孔丹。这些干部子弟比较注意政策，认为做事不能过激，跟工作组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听说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批评工作组以后，他们就面临将来要怎么办的问题。

西城区的高级干部子弟，不论是宋彬彬、孔丹，还是陈小鲁，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入党了，都是学生模范、三好学生等。文革开始之后，有的学生积极贴大字报批校领导，比如刘进、宋彬彬；有的学生是接受现实跟着批校领导，这才能在工作组时期维持学生领袖地位。

但接着工作组又倒了，曾经受到工作组器重的学生有不同的表现。北京多数中学没有学生批评工作组，所以一些高干子弟就转身带头批工作组。他们消息灵，比别人更早知道中央要撤工作组，由于当时特别强调血统论，他们还成了红卫兵的领袖人物。例如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照理说，他们是工作组下面的既得利益者，应当保工作组，但他们抢先转而批评工作组，保住了左派的地位。这种作法后来被指责为政治投机。

但是城区的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和二十五中这三所中学有学生批工作组，所以师大女附中刘进、宋彬彬这样跟随工作组的人即使想转弯，也不容易了。工作组在的时候，刘进、宋彬彬和工作组站在一边，批过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所以宋彬彬向毛泽东献袖章的当天，批工作组的那派红卫兵就找刘进说：你们犯了错误，不配去献袖章。刘进说：那怎么办？我们把红卫兵的臂章要回来吧？她果真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王任重提出更换袖章。这就说明刘进、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不可能像四中、六中、八中高干子弟那样轻易转弯。

陈小鲁的情况也很有趣。他听父亲说过，除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其他的任何组织都不要参加，所以陈小鲁没参加红卫兵，但是仍然被红卫兵拥为领袖。究其原因，一来是陈小鲁在学



生中有威信，二来是血统论的影响。陈小鲁是八中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党员，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领袖；他父亲又是八中学生家长中级别最高的老革命。

这里还有一些细节，也值得注意：真正起来挑战工作组权威的老红卫兵多是中高级干部子弟，像清华附中、北大附中是以司局级和副部级的干部子弟为主。可是西城区的红卫兵，像四、六、八中学生领袖的父母多是中央级、省部级干部。这是不一样的，中央级高干是众人皆知的传奇英雄，像陈毅的文采和个性，在社会上口碑甚好。因而中央级干部子女不必高调登场就已经被推上舞台了，他们往往不是红卫兵的发起者，而是被人拥戴出来的。中央级干部的子女是血统论的实际受益者，同时又不必自己来特别强调出身。而不知名的司局长级中高级干部的孩子，需要抱成一团来争取利益，要高唱“老子英雄儿好汉”为自己壮声势。

老红卫兵是1966年8—9月所谓“红八月”血腥暴力的发起者和主力，保守派是参与者，造反派则很少参与，他们正在争取“平反”。但是也要看到，不是所有的老红卫兵成员都参加了打人。具体到个人的表现，要做个案考察。

#### ◇ 老红卫兵对中央文革的反抗是反思文革的重要起点

印红标：老红卫兵还有一个特点是反对普遍冲击党的领导干部。这主要因为他们自己跟党的领导干部就有血缘关系，虽然说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实际上不用上刀山、不用下火海，当革命革到自己爹妈头上，他就不理解、不革命了。但他们的反应，与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就敢反，自以为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是反革命。中央文革小组批老干部，他们就最早反对中央文革。他们误解了文化大革命，以为是批知识分子，只是文化界的革命。其实文化大革命是政治的革命，是党内斗争，主要批老干部、批当权派。

老红卫兵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抗，虽然明显带有维护自身利益，甚至是特权利益的局限，但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打击老干部是应当肯定的，反对动用专政机器镇压老红卫兵是合理的。他们的抗争是老红卫兵反思的重要表现和起点。夏天被捧上天安门，冬天被批判，甚至进监狱的大起大落，使很多老红卫兵产生了强烈的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命运，直至走出文革的思想误区。

#### ◇ 文化大革命是“毛天下”和“党天下”之争

印红标：红卫兵的第二个派别是保守派。保守派最大的特点是依靠党委或工作组开展运动。保守派赞赏“血统论”，但是认为不要太过头，要按党的政策执行阶级路线。今天看来，当时所谓“党的政策”也是左的错误的。

各级领导干部（当权派）构成了等级制的党政军领导体系。毛泽东的文革要发动群众冲击党政领导体系，揪出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因此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天下”和“党天下”之争，很传神。所谓“毛天下”就是凭借个人魅力，凌驾于全党之上，说什么就是什么，毛是个人魅力型的享有个人崇拜地位的领袖；而刘少奇依靠的是党的组织体系，是党机器的化身，他的所有指示都是靠党的组织贯彻，而不是个人。党组织在社会面前，包括群众面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但是遇到了毛泽东和他发动和指挥的群众的上下夹击。群众的政治合法性则完全仰赖毛泽东的支持。

保守派与受到毛泽东支持的老红卫兵的关键区别是在刘少奇、邓小平领导运动的50天里，对基层权威，即工作组或党委的态度不一样。最典型的就是清华大学的保守派，贺鹏飞、刘涛一派是受工作组扶植的，由于蒯大富挑战工作组，他们参加了反蒯大富行动，所以后来即使要

转身批工作组，也办不到。

大学的派别分歧是全国性的，在大部分大学里，争论的焦点是对工作组的态度。有的学校没有派工作组，继续由党委领导。保工作组或党委的学生形成保守派。大学学生的派别分歧基本起源于对工作组和党委领导的分歧，不同于中学起源于血统论之争。毛泽东始终不喜欢保守派，因为保守派要保护当权派。

北京的中学生干部子女形成了老红卫兵派，而其他地方的干部子弟大多相信党组织和工作组，属于保守派。在上海、武汉、沈阳等中央大区局所在地，高中级干部的子女也模仿北京学生，成立了红卫兵，但是他们的父母就是当地的党委成员，是与工作组处于同一个党政体系之中，所以那里最早成立的红卫兵通常是保地方党委的，在一开始就是保守派。

可见，保守派是全国性的组织，而老红卫兵基本限于北京，并且限于中学生。老红卫兵一开始是被说成反工作组的人，所以毛泽东才支持他们。接着，干部子弟很快成立了红卫兵，不论对工作组的态度如何。其实中学的多数干部子弟并没有跟工作组闹摩擦，一些高干子女还受到工作组的器重。他们转而成为红卫兵的头头，使红卫兵逐渐失去了毛泽东所赞赏的反工作组的特质。

红卫兵把自己的组织看成“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子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队伍，把争取家庭出身问题上的特权看得比反工作组还要重要，只要是干部子女或“红五类”，就可以成立红卫兵，致使红卫兵原来的反工作组色彩被冲淡。这是红卫兵的第一次变质或者变味。刘进、宋彬彬就是在这样的变味之中，凭着高干子女的身份成为红卫兵的。这也是她们为什么缺少尽早成立红卫兵的强烈冲动的的原因。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她们曾经听到工作组，甚至邓小平本人对红卫兵的负面评论。

把红卫兵内部的复杂性厘清，才有能批判到要害。不能抓住一个“宋要武”的符号，忽视历史事实，文章写得再尖刻，也难于面对史实的拷问。严肃的文革批判，理应摒弃概念化、简单化的套路。（未完待续）

□ 原载《凤凰网历史》2014年2月28日

~~~~~

## 【史海钩沉】

### 文革中军管干部的困境

• 文 贝 •

#### ◇ 文革中军管的过程

1967年1月19日，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强调说：“国防工地、机要、要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仓库，实行军事管制，不进行夺权，不改组领导机构”。由粟裕大出

任军管会主任，解放军抽调上万名干部参加了对国防工业的军管。

3月19日，中共中央又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后来统称“三支两军”。

1967年4月3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设立军管工作办公室，作为全军军管工作的办事机构，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吸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及军委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参加。任务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办理中央交办的有关事项。同年11月，军委军管工作办公室撤销，军管的具体事宜改归军委办事组负责

1967年4月16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高等军事院校进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对军事院校实施了军事管制。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是军管和警卫、保护单位最多的时期。1967年7月初，全国实行军管和警卫、保护的单位达到10306个。1970年年底，全国实施军管的单位为7400多个，使用兵力约6.5万人。（国防大学编印，《“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第193页）

“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工作部门共有部委机构48个，其中对43个部委宣布实行军管，22个直属机构绝大部分实行军管。中共中央所属部门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等也都先后实施军管。

1967年1月中旬开始军管至3月上旬，主要以恢复秩序为主要目的。从1967年3月中旬至1968年9月，军管工作主要是支持“左派”掌握权力，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同时维持生产生活秩序。从1968年10月全国进入“斗、批、改”运动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军管结束。军管工作包括维持革委会的权威，组织进行正常的工作、生活，领导“斗、批、改”的各项活动。在1968年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70%以上的一把手由军区司令员、政委或军长、政委担任。

1972年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了撤销军事管制领导机构的决定，相关的军事管制指挥机构相继撤销，军管人员陆续撤回军队到1972年底，大部分军管干部都归建，只有少部分军管干部被结合进地方领导班子。极个别的直到1975年才撤出（中宣部1975年11月才撤出）。有的军管干部被结合到地方革委会，成为地方干部。

#### ◇ 军事管制的形式与内容

军事管制（简称军管）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派出军队，对全国或局部地区实行行政管理和控制的特殊措施。它的基本特征是：在实行军事管制的时期和地区内，政府机关的权力职能，全部或部分地交给军事管制机构。

军管有军事接管和军事管制两种形式。

军事接管很多不是暂时性的措施，而是较长期性转隶。是军队对某些与军事建设有关的单位纳入军队系统，不仅接管权力，而且这些被军事接管的单位，后来大部分转隶为军队单位。

军事管制属于临时性措施，是临时接管政府权力。在军事管制期间，军事当局强使遵守军管法，履行必要的义务，以维持社会秩序。军事管制的时间一般较短，完成任务后移交权力。

军事管制的组织机构一般称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事管制小组，部分单位则是以派驻军事代表的形式存在。

文化大革命中军管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是，除特别指明只负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一是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斗争；二是领导业务工作，维持生产、生活秩序。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被军管的单位，一般在军管会之下设两个工作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业务。

军管人员此时既受地方上级军管单位领导，参加地方活动，又不失原来部队的隶属关系，其发生的一切费用，如伙食费、工资、差旅费、卫生医疗等，一律由原部队供给。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事接管、支左、支工支农和军事管制许多方面混在一起。军事接管的单位，有些也有工宣队的介入。军事管制里既支且管，与军队支左搅合在一起。许多单位既有军人掌权，又有地方干部掌权，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管制。

#### ◇ 从徐州军管看军队军事管制的困境

就军事管制而言，军事当局的法令是基本原则，军管权威是第一位的。然而文革中的军事管制涉及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派性，军管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充当了“裁判员”式的中间力量。

支左就是支派，在没有标准区分的情况下，支持一派就意味着打击另一派。造成被支持一的派兴高采烈，被打击的一派把冤气洒向了军队。甚至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军管势必要管理地方事务，不仅有业务和管理水平的问题，也很难使地方服气，容易产生军地矛盾。

中央上层的权力之争直接影响了军队支左的方向。同时由于军队内部立场不同，观点不一致，在支持那一派，谁参加权力机构，甚至让谁当正职谁当副职无法达成一致。野战军和地方部队、这一部队和那一部队互相争吵，直接导致权力反复，很大程度延误了政权的产生。使军队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涡，严重地损害了军队自身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建设和军队的发展。

江苏徐州市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要冲，历史上以乱著称。1967年初，徐州的造反派夺了徐州市委的权。由于造反派内部发生了分裂，形成了“踢派”组织“工总司”和“支派”组织“淮海八三一”，两派经常发生武斗。

徐州驻军有济南军区序列的第68军、坦克二师、空军29师，有隶属于南京军区的军分区部队，还有归总部直接管理的军队院校。这里面68军（军长张铨秀，后任军长吴怀才）与坦克二师（军委装甲兵，师长杨金山，政委史世屏）、空12师和空军工程兵部队108（师级，军委空军）都没有直接隶属关系。

中国铁路的两条大动脉——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在徐州交汇。铁路局当时归济南铁路局管辖。

这就带来了复杂的问题。徐州成立革委会需要江苏批准，支左部队和军管由68军负责，归济南军区指挥。也就是行政管理与军事管理机构严重脱节。文革工作一方面要向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负责，支左部队又要受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济南军区杨德志、王效禹、袁升平调遣。

南京军区许世友在江苏支左支的是“保派”，而济南军区支的是“造反派”。虽然1967年3月经过许世友与杨得志协调成立了以68军副政委刘汝贤为主任的市革委会，由于派性激烈，很快形成了支持革委会的“支派”和反对并踢开革委会的“踢派”。造成徐州革委会几次成立和换班，有人称之为“踢得好，支得对，一年一个徐革会，干部乱站队，群众跟着活受罪”。

68军军长张铎秀出身于华野九纵，是许世友的老部下。副军长吴怀才红四方面军出身，也是许世友体系。结果是68军给许司令面子，受到许世友的支持，军队成了“支派”。

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是王效禹，文革后造反起家成了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他以济南铁路局为依托，插手徐州事务，指责68军脚踏两只船。

1967年5月31日，徐州铁路分局实行“军管”。坦克二师五团团长金正新任军管会主任，包括铁路各个段都实行了军事管制。68军则负责德州（不含）至蚌埠（不含）和连云港、郑州（不含）——潼关段的铁路部门军事管制。68军和坦克二师是各管各的。

由于军队支持了保派，“踢派”喊出了“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的口号，联合山东枣庄等地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说张铎秀是徐州的“新沙皇”。

山东革委会王效禹杨得志以省革委会和军区的名义强令驻徐68军思想转弯。7月11日，徐州卫戍区发出支持踢派的通告，从而将“支派”赶出徐州，徐州组成了以踢派为核心的革委会。

这样的结果是形成了济南军区军管与南京军区主导的江苏革委会的对立，也是后来徐州“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清查“五·一六分子”扩大化的原因，有人认为是许世友展开的报复。

1969年，中共中央为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特许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徐海班”（简称“徐海班”）。徐州两派“造反派”组织代表及解放军有关“支左”人员代表计100余人到达北京，其中包括27名山东代表，由周恩来亲自负责。学习班期间，毛泽东针对徐州的“文化大革命”作过几次讲话，批评徐州两派先后各自为政。提出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等等。周恩来也批评驻徐部队“支左”态度不端正，变了几次，强调武斗双方都有责任。经过学习，几经反复，徐州地区两派在实现大联合等问题达成协议，历时1年零18天的“徐海班”结业。1969年8月1日，徐州市第三个革委会和江苏省徐州专区革委会同时宣告成立。

王效禹后来虽然下台了，但主持文革的袁升平并没有多大改变。1972年军管干部撤出后，“踢派”占领了徐州市委大楼。铁路运输状况更加恶化，领导班子半瘫痪，调度不灵，站内线路堵塞，影响全国。

1975年3月9日，刚刚上任不到二个月的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带着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了徐州。由市委书记汪冰石亲自指挥徐州市公安机关、民兵指挥部，将“踢派”为首分子顾炳华（铁路工人，徐州“工总司”头头，市革委会常委，

后判刑18年)、铁路革委会主任杨正祥(在劳改队呆了十九年)逮捕,押往南京分别关押审讯。万里还点名抓捕山东造反派头头杨坡兰(青岛纺织工人,中央后补委员)和铁路支派头头三中学生张晓阳。铁路基本恢复了秩序。

从徐州文革军管的复杂性可以看出,军管人员可以说无所适从。既有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又有群众运动的推动。既受济南军区的领导,又受南京军区的节制。根本分不清谁是谁非,那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完全处在夹缝中。

由于68军在文革中陷入太深,1975年,为解决徐州问题,中央军委决定68军与沈阳军区46军对调移驻吉林省吉林市。1985年百万大裁军时番号撤销,全军连个建制单位都没有留,是当时五十多个军中最可怜的一个。

#### ◇ 支持保皇派正确是一种悖论

在后天的语境里,陈再道的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是对的。他支持了湖北省委和保皇的“百万雄师”,镇压起来造反的“工总司”。

事实上,军管及其支左,大部分部队都是支持了原党委和保护老干部,对群众组织的造反派进行打击。它的逻辑是原党委是正确的,老干部是好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无论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大部分都来自于军队,许多人都曾在一个战壕里战斗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当时干部布局而言,战争年代的各个系统又集中在一个地方任职,或在军队或在地方,许多人不仅是战友,而且有近亲关系。这种情况下,他们从感情上理所当然的联结在一起。就军队高层而言,在政治与关系的选择上更多倾向于关系。

这样的选择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文革的理念形成了冲突。支持保皇派及老干部,违背了毛泽东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被衷。支持造反派,则意味着对老干部的打击,感情上过不去。这种矛盾纠结不是某一个单位,而是自上而下全国性的问题。

比如军管最敏感的公安系统。以高干子弟红卫兵为主的北京“西纠”和“联动”最先冲击公安部,受到军管下的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打击。这些被抓起来的红色接班人都是“天之娇子”,打了孩子爹痛,老干部的抵触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后来由毛泽东下令释放了,这个底火或者说是怨仇却记在了公安军管干部的头上。比如对一些犯错误干部的拘押,虽然是中央专案组办的案件,但具体实施是军管下的公安部门。再比如1976年的“五四纪念碑”事件,清场的主力是民兵和首都公安,这个账也记到了军管干部头上。

正因为此,军管干部后来整肃最重的是公安系统的,很多干部由于军管公安落得可悲下场。最典型的是公安部的李震(原十二军副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任公安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后自杀)、曾威(原黄勇胜的13兵团37军109师政委、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75年调回部队任天津警备区政委)、施义之(原三野21军政委,军管时担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文革后被开党籍、军籍,每月生活费150元。留有口述文章《李震之死》)、赵登程(原为三野许世友的九纵改编的空15军师长,后调空八军副军长,公安部革委会副主任。83年被判刑15年)。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南京军区27军副政委,文革后受审查时自杀)、王更印(陆军第55军215师政委,1984年2月23日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刑10年)。这些在公安系统的军管干部表面上说他们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捏造事实,制造冤案,诬陷迫害老干部,其实根本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和公安部长谢富治被否定了,他们只能找军管干部出气。

“后来一翻过来，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刘传新是一个军的副政委，王更印是一个师的政委。军队“支左”也是波折很多，一开始是不知道群众组织的情况，都支持了。突然间，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支左”支错了，让“支左”人员掉屁股。这个掉屁股的过程，军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又批评把屁股又掉错了。军队那时很难办，没有一个大军区不检讨的。”（吴德《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作者：吴德口述·访谈、整理：朱元石等。摘自《风雨十年纪事》）

对公安部领导小组核心成员赵登程的判刑理由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他诬陷的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包括朱德、陈毅、李富春、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等，如果按照起诉书所言，这位副军级的军管干部可谓能量不小。诬陷罪的最高量刑是三年，他却领刑十五年。

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的判刑理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谢富治的授意，捏造事实，提供诬陷材料，致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务能领导干部受到诬陷迫害，参预制造冤案，诬陷迫害首都广大公安干警，破坏首都公安机关，后果严重。判决书中提出了此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副局长吕展（兼任北京公安总队长政委）、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23名局处级干部被捕一事，其实这些人被捕是1966年5月的事，跟1967年才参加军管的王更印根本没有关系。虽然如此，也领刑十年。

要论诬陷的话，刘少奇诬陷彭德怀，邓小平诬陷刘少奇。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诬陷罗瑞卿，成钧、廖汉生、许光达诬陷贺龙，周恩来负责的中央专案组诬陷一大批老干部等等文革中的揭发行为都应当判刑。

奇怪的是审判这两位军人的不是军事法庭，而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事实上这两个人是替死去的谢富治、李震、刘传新和活着的华国锋担责，他们才是文革中公安系统的直接负责人。

后天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军管，却选择性的对军管支持造反派予以否定。这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逻辑。既不是政治也并非正义判断。而是以官僚与民众划线，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

#### ◇ 军管干部是军人而非政客

其实这些军管干部参加军管是职务行为，是服从命令。他们是军人不是政客，不具备明辨政治优劣的能力。他们作为军人是下级服从上级。文革期间的许多活动是受上级调遣，按命令行事。他们镇压或打击反革命是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执行的是当时的法律《公安六条》。他们即使犯有错误甚至罪行，也是军人履行职责中犯的错误，只能由军事法庭对他们惩处，地方法院无权审判现役军人案件。

就政治环境而言，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否定了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对官僚阶层的革命。否定军管干部的履职，也否定了军人服从命令的基本要求。

它的问题在于当“联动”冲击国家机关时不能干预，当保皇派组织围剿造反派群众时只能支持，对中央的指示或者军委的命令军人可以选择。如此说来军队不是服从命令，而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行事。这种情况下，当国家出现动乱需要动用军队时，军人是动还是不动？天安门清场时不服从命令的38军军长又算是什么？如果这次事件以后被翻了过来，那些参加平息

动乱任务的几十万大军的长官们是否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军管在文革动乱的社会环境下，制止了武斗等激烈行为，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和重要单位、设施免遭破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局势作用。

事实上从1966年到1976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1%，虽然潜藏着危机，但总算还是增长的，这些建设成就与军队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军管干部绝大多数是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办事，执行的是上级命令。违法乱纪者是少数，就像任何地方都有各类不同的人一样，不能因此否定他们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所做出的努力。

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的结局大部分都不太好。他们参加军管后，军队不得不提拔新干部补缺。“三支两军”结束后，这些干部回到部队失去了位置，只好转业。在转业高峰时，国家实行那里来那里回的政策，很多干部到地方后都不按干部安排，到了厂矿企业。1978年后又落实政策，给他们以干部待遇。

“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管制并不符合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与他依靠群众闹革命夺权的思路相悖。由于群众派系分歧较大，权力机构无法产生。国家和社会陷入混乱的危险局面，不得已通过军队的介入帮助建立政权。这是混乱形势下的无奈之举，也是最后最有效的手段。军人参预地方政权终究是暂时性的，他们退出以后，权力仍然交到了原来老干的手中。

1981年5月，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军管的官方评价。

□ 来源：文贝博客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